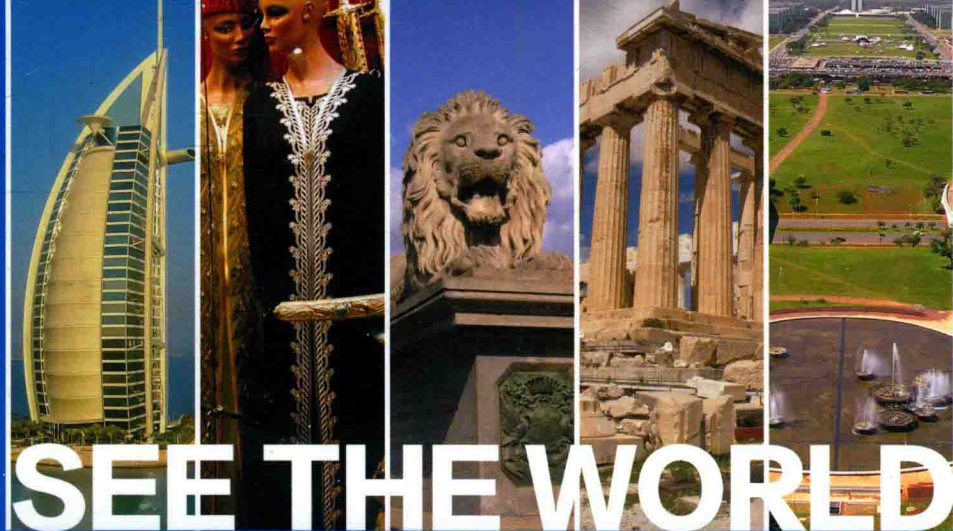




SEE THE WORLD

跟着大使 看世界

主 编 樊亚玲 阎 峥 甄建国



中国国际出版集团
China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Group



朝華出版社
BLOSSOM PRESS

SEE THE WORLD

跟着大使

看世界

主 编 樊亚玲 阎 峥 甄建国



中国国际出版集团
China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Group



朝華出版社
BLOSSOM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跟着大使看世界 / 樊亚玲, 阎峥, 甄建国主编. --
北京: 朝华出版社, 2017.6
ISBN 978-7-5054-3994-8
I. ①跟… II. ①樊… ②阎… ③甄… III. ①世界—
概况 IV. ① K9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115231 号

跟着大使看世界

主 编 樊亚玲 阎 峥 甄建国

选题策划 张汉东
责任编辑 吕 哲
责任印制 张文东 陆竞赢
封面设计 浦洋伟业

出版发行 朝华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24 号 邮政编码 100037
出版合作 (010) 68995593
订购电话 (010) 68996050 68996618
传 真 (010) 88415258 (发行部)
联系版权 j-yn@163.com
网 址 <http://zhcb.cipg.org.cn>
印 刷 北京利丰雅高长城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710mm × 1000mm 1/16 字 数 230 千字
印 张 14.75
版 次 2017 年 6 月第 1 版 201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装 别 平
书 号 ISBN 978-7-5054-3994-8
定 价 58.00 元

跟着大使看世界编委会

主 编 樊亚玲 阎 峥 甄建国

副 主 编 郑彩萍 王 璇 吉晓明 郭 斌

执行编辑 崔月强

编 辑 周 园 柳超英

序 言

自 2012 年以来，中国国际友人研究会与北京市西城区第一图书馆共同举办“外交官带你去看世界”系列讲座，每月一讲，每次讲一个国家。我们邀请曾经在有关国家长期工作的退休大使主讲，迄今已坚持五年。

作为一项公益活动，“外交官带你去看世界”系列讲座面向公众，自举办以来一直受到读者的欢迎。每次讲座读者人数都不少，而且各个年龄层都有，往往出乎主讲老大使和有关单位的意料。我们想，讲座的成功可能有两个原因：

首先，讲座内容不同于用书面语言介绍各国概况的百科全书或年鉴，而是由在相关国家工作过的老大使结合亲身经历讲述驻在国的历史文化、中国与相关国家的友好交往与互利合作，以及这些国家中友好人士的感人事迹，因而更加生动、鲜活，更加贴近读者的兴趣点。讲座结束之后，读者往往意犹未尽，在互动阶段向主讲人提各种各样的问题，气氛热烈。

其次，读者的积极表现充分表明，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随着中国国际地位进一步迅速上升，随着中国与世界的关联越来越紧密，中国公众对外部世界、对中国的外交、对中国与各国的关系也更加关注。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这也反映出中国公民的整体素质同样在进一步迅速提高。

中国国际友人研究会成立于 1984 年。首任会长系原外长、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黄华同志。首任名誉会长是时任全国政协主席的邓颖超同志。中国国际友人研究会成立的宗旨是缅怀当年帮助过中国人民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国际友人，发掘整理相关资料，出版系列丛书。随着时代的发展，中国国际友人研究会除继续与上述国际友人的亲友及国外相关友好团体保持联系并组织纪念和交流活动外，还积极参与各项有利于中外人民相互了解、增进中外人民之间友谊的活动。因此，能够配合西城区第一图书馆推进社区精

神文明建设，举办好“外交官带你去看世界”系列讲座，我们感到十分高兴，将之视为应尽的职责。这次西城区第一图书馆决定将部分讲座内容编辑出书，无疑是进一步传播正能量、让更多受众得益之举。我们谨向西城区第一图书馆表示感谢！同时，我们也要向热心公益、积极应邀做讲座的老大使们致谢！

今后，中国国际友人研究会将继续为做好西城区第一图书馆“外交官带你去看世界”系列讲座做贡献，使之越办越红火！

马灿荣

（中国国际友人研究会会长）

中国外交的缘起与发展^{*}

（代前言）

一、新中国外交的缘起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工作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延安时期。

中国国内形势。1935年，中国工农红军经过长征到达延安。此时，中国正面临着严重的民族危机。1935年底，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瓦窑堡会议）。中国共产党及时制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

国际形势。此后，毛泽东在论述统一战线问题上又强调要对“帝国主义”加以区别对待。随着美国谴责日本和援助中国的立场逐渐明朗，1940年底，毛泽东对党内起草了如下指示：“在外交上，同英美及其他一切反对德意日法西斯统治者的人们联合起来，反对共同的敌人。”毛泽东战略思想的重要内容就是要对“德意”和“英美”加以区别。

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美国和中国成了战时盟友。但是，美国和中国国民党政府在军事战略上存在着尖锐的矛盾。（1）美国战时对中国的期望，是使中国成为一个“能极大地毁坏日本的作战基地”，最后



苏格大使

^{*} 本文根据苏格大使2014年4月17日在北京市西城区图书馆（今西城区第一图书馆）演讲的部分内容整理而成。

战胜日本。(2) 蒋介石出于“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不愿将主力真正用来对付日本。(3) 珍珠港事件使美国的外交政策发生了积极的变化。中国共产党则倡导“建立与开展太平洋各民族反日反法西斯的广泛统一战线”。

然而,在太平洋战争初期,中国共产党的积极态度并没有引起美国的重视。罗斯福出于战时抗击日本和战后维持世界秩序的目的,虽然力图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但美国政府仅和国民党政府保持联系。

《西行漫记》等早期与中共接触的记者所撰写的访问记,使美国驻华使团中的部分成员对中国共产党抗日根据地表现出浓厚兴趣。另一方面,中共驻重庆代表团,特别是周恩来杰出的外交工作,也帮助一些美国人改变了对中国共产党的成见。1944年6月,美国副总统华莱士(Henry A. Wallace)访华期间,表达了美国政府对国共分歧的关注,并迫使蒋介石同意美国政府派军事观察组到延安考察。

美方有三个考虑:(1) 国共关系的恶化不利于中国战区对日作战;(2) 国共关系的恶化将导致中国内部冲突,并严重影响中国政治统一;(3) 国共关系的恶化可能导致将来中苏关系复杂化。观察组的任务就是探求如何才能缓解国共之间的矛盾。1944年7月22日和8月7日,美军观察组——“迪克西使团”分两批抵达延安。美军观察组由包瑞德(David D. Barrett)上校任组长,成员包括谢伟思(John S. Service)等共18人。美军观察组受到中共中央、陕甘宁边区政府和当地驻军的热烈欢迎。

毛泽东主席亲自给《解放日报》社论定稿,在原稿标题“欢迎美军观察组”之后增添了“战友们”三个字。1944年8月18日,中共中央发出中共外交史上第一份重要文件《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将美军观察组来访看成是“我们在国际间统一战线的开展,是我们外交工作的开始”。

二、向社会主义国家“一边倒”的政策

中国共产党同美国进行了积极的接触,但是,以赫尔利(Patrick Jay Hurley)使华为转折点,美国对华政策的重心就渐渐地偏向国民党一方了,形成了“扶蒋反共”的政策。抗战一结束,美国就帮助国民党政府运送大批军队开赴要地接受日军投降,帮助蒋介石“下山摘桃子”。



随着战后国际形势的变化，“杜鲁门主义”和“马歇尔计划”相继出笼，美苏“冷战”拉开序幕。此后，在对苏联总的“遏制”战略的框架下，美国对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的胜利的前景一直持有敌视和阻挠的态度。

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之后，中国革命的形势发生了历史性的转变。毛泽东在1949年3月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期间，展望了新中国可能面临的国际环境及其外交对策。（1）原则性。毛泽东预言：“帝国主义”国家“决不可能很快地就以平等的态度对待我们”。因此，新中国的方针便是：只要帝国主义一天“不改变敌视的态度，我们就一天不给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以合法的地位”。（2）灵活性。我们“也要同资本主义国家做生意”。

在此次会议前后，毛泽东还提出了新中国外交的两个重要方针：“另起炉灶”和“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按周恩来后来的解释，“另起炉灶”就是“不承认国民党政府同各国建立的旧的外交关系，而要在新的基础上同各国另行建立新的外交关系”；“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就是说“帝国主义总想保留一些在中国的特权”，“我们要在建立外交关系以前把‘屋子’打扫一下”。

1949年4月，人民解放军挥师过江，南京解放。此时，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John L. Stuart）仍滞留南京，伺机与中国共产党接触。4月28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了致邓小平、刘伯承、陈毅等人的电报，指示我军对英、美侨民和外交人员予以保护。电报指示：“如果美国及英国能断绝和国民党的关系，我们可以考虑和他们建立外交关系的问题。”

1949年5月，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复电，指示南京军管会外事处处长黄华可以同司徒雷登接触。黄华与司徒雷登会晤后，了解到司徒雷登有意重访燕京大学，请示中央后，向其发出邀请，但美国国务院明令指示司徒雷登“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访问北平”。

在美国政府没有给中共领导人选择余地的情况下，中共和苏共之间的关系有了新的发展。1949年1月底，斯大林派遣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到达中共中央驻地——河北西柏坡。参加这次高度机密会议的中共领导人仅有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和任弼时。此次访问增进了苏联对中国革命形势和中共中央路线方针的了解，对新中国争取苏联的支持起了积极的作用。1949年6月下旬，以刘少奇为首的中共中央代表团又秘密访苏，同斯大林及联共（布）其他领导人举行了五次会谈。中方向苏联通报了新中国

开国的准备工作以及内外政策，包括对外执行“一边倒”的方针。斯大林对苏共与中共接触过程中的“失误”表示了歉意。这次访问为中苏关系的建立奠定了基础，斯大林表示新中国成立之后，苏联将“立刻承认”并给予援助。

1949年6月30日，毛泽东宣布：新中国成立之后所奉行的将是向社会主义国家“一边倒”的外交政策。

三、从“一边倒”到“一条线”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而美国政府10月3日宣布继续承认国民党政府。毛泽东于1949年12月6日访苏，1950年2月14日，《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该条约的签订，标志着中国外交向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一边倒”政策的正式实施。

从美国对华政策制定的角度而言，美国政府曾一度因图谋离间中苏关系而暂时采取了“等待尘埃落定”的政策。随着《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美国决策集团中的一些人在中苏之间“打入楔子”的幻想破灭。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美国迅速做出介入战争和派遣第七舰队侵入台湾海峡的决定。

在中国领导人看来，美国的决定无疑是将朝鲜内战国际化的行动和对新中国武装侵略的开始。出于国家安全的考虑，中国领导人最终做出了赴朝参战的战略决策。中美两国走上了直接军事对抗。在朝鲜战争中，中国对美政策的重点是反击美国的军事进攻，但同时以打促谈，争取和平解决朝鲜问题。

使中美交恶的最重要原因，就是美国对中国内政——台湾问题的干涉。中国在台湾问题上同美国斗争的焦点就是要维护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美国早在中国革命胜利之前就密谋了诸如“分离”和“托管”等防止台湾“失陷”的途径，但慑于“政治影响”，杜鲁门（Harry S.Truman）不得已于1950年1月发表了一份“不介入”的声明，以观望等待。朝鲜战争的爆发为美国军事干涉中国内政、染指台湾提供了时机和借口。美国政府采纳了麦克阿瑟（Douglas MacArthur）视台湾为“不沉没的航空母舰和潜艇基地”之战略分析，悍然派遣第七舰队武装侵入台湾海峡。中国政府严正揭露了美国的侵略行径，同美国在联合国讲坛上就台湾问题进行了面对面的交锋。至此，台湾问题成



为两个没有外交关系大国之间的最大争议问题。

1954年9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始炮击金门。炮击金门可被视为《孙子兵法》所讲的“上兵伐谋”的行动，其目的是防止台湾问题固定化，反对美国“两个中国”的阴谋。美国和台湾当局既矛盾又勾结，缔结了一个所谓的“共同防御条约”。

1958年，台湾海峡风云又起，美国再次对中国内政横加干涉。中共中央做出了“中美两国没有开战，无火可停”和“把蒋介石留在金、马”的战略决策，以“谈谈打打”“打打停停”的策略，挫败了杜勒斯（John F. Dulles）“战争边缘”的讹诈政策。

然而，国际关系的风云变幻时常出现“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历史变迁。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力量的重新组合产生了“雅尔塔体制”，导致中苏结盟和中美交恶。从新中国成立到20世纪60年代末，中美关系实为国际间以美苏为首的东西方两大阵营“冷战”对峙之组成部分，从某种意义上讲，中美双边关系亦可视为美、苏、中三角关系之一部分。而这一大的非等边三角关系中又包含着美国、中国大陆和台湾之间的小三角关系。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中苏关系恶化，中方一度奉行的政策是“两个拳头打人”“反帝必反修”。

中苏关系成为中美两国接近的催化剂。中苏关系破裂的原因之一就是苏共中央当时奉行大国沙文主义，企图控制、指挥中共中央，而把独立自主视为党的生命线的中国共产党与其进行了坚决的斗争。随着霸权主义的恶性发展，苏联在1968年公然粗暴践踏别国主权和领土完整，武装入侵捷克斯洛伐克。1969年，中苏边界爆发了苏军入侵我珍宝岛的严重事件。苏联不仅在中苏边界陈兵百万，还有试探袭击中国核基地的可能，对中国形成巨大的军事威胁。

而此时的美国，却因深深陷入越南战争的泥淖中而大伤元气、内外交困，被迫进行后被称为“尼克松主义”的战略收缩，即为确保同苏联争霸中的欧洲战略重点，谋求从印度支那脱身，实现所谓“均势外交”。毛泽东早在1967年就敏锐地注意到了尼克松发表在《外交季刊》上的文章《越战后的亚洲》，其中有一句耐人寻味的话：“从长远来看，我们简直经不起永远让中国留在国际大家庭之外。”毛泽东让周恩来等人阅读此文，因为他认为，尼克松如果竞选成功，美国有可能改变对华政策。

1969年春，在毛泽东的指示和周恩来的具体安排之下，陈毅、叶剑英、

徐向前和聂荣臻等四位老师接受了“研究国际形势”的特殊任务。1969年7月11日，一份题为《对战争形势的初步估计》的报告呈交到周恩来总理处。这份报告全面分析了“中、美、苏三大力量之间的斗争”，指出：“在可以预见的时期内，美帝、苏修单独或联合发动大规模侵华战争的可能性都还不大。”报告关于中苏矛盾大于中美矛盾、美苏矛盾大于中苏矛盾的战略分析，对打开中美关系之结提供了依据。此后，从7月下旬至9月中旬，四位老师又对以下重大课题进行了反复研究。经过多次讨论，老师们提交了题为《对目前局势的看法》的包括上述战略思想的报告。

在上述报告酝酿之时，中国正受到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威胁，国家安全正面临严峻的考验。毛泽东把这种情况形象地比作“夹肉面包”。然而，毛泽东毕竟是纵横捭阖、运筹帷幄的国际战略大师，在慎重考虑和反复观察之后，毅然做出了“打美国这张战略牌”的战略决定，开拓了中国外交的新局面。用陈毅的话来讲，就是“主席下了这着棋，全局都活了”。毛泽东的战略决策就是面对苏联侵略的威胁，建立一个从中国经中东到西欧，越过大西洋到加拿大、美国，再经过太平洋至日本，并且包括太平洋南岸的澳大利亚、新西兰在内的，反对霸权主义的“统一战线”。与此同时，再将这条线周围的一大片亚非拉国家团结起来，形成“一条线、一大片”的格局。

毛泽东1970年对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表述了“如果尼克松愿意来，我愿意和他谈”和“中美两国总是要建交的”等战略观点。在美国政府做出愿意改善关系的表示并采取有关行动后，周恩来又亲自策划了中国乒乓球队对美国的民间外交。按毛泽东的指示，应该给美国乒乓球队发出邀请，这就“将了美国国务院的军”。1971年初中国成功实施了“乒乓外交”，使“小球推动了大球”。在周恩来总理接见美国乒乓球队数小时后，美国政府决定取消美国公民来华旅游的禁令。1971年7月，基辛格（Henry A. Kissinger）完成了对北京的首次秘访。10月，在基辛格第二次秘密访华期间，毛泽东和周恩来亲自过问未来中美联合公报的拟订，既坚持原则又体现灵活性，推动了中美和解的历史进程。1971年10月25日，第二十六届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得以恢复。

1972年2月21日，尼克松访华。毛泽东在和尼克松的历史性会谈中，表达了建立中美关系的战略观点，即“现在不存在中美两国互相打仗的问题”。



两国领导人谈笑风生，双方的交谈在轻松的气氛中进行。《上海公报》的发表，以国际法律文件形式结束了中美两国长达 22 年的对立僵局，打开了双边关系正常化的大门。文件中包含的“反对霸权主义”的内容，体现了毛泽东所构想的建立“一条线”的国际反霸统一战线的战略思想。虽然中美两国在意识形态与台湾问题上仍有分歧，但出于战略安全的考虑，双方能超越分歧，寻求共识。中国外交就此实现了又一次重大的战略调整。

总之，由于苏联霸权主义对世界和平和中国国家安全的威胁，中国对美国实行了“联合反霸”的方针，同时又不懈地为维护国家主权进行着“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中美关系中虽存在种种分歧，两国在战略上的合作却得以维持。

四、“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

20 世纪 70 年代末，中国国内的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1978 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方针，做出了将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1982 年，党的十二大确定了中国在新的历史时期面临的三大任务。其中两项是国内的，即加紧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争取实现祖国统一；另一项是国际方面的，即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1987 年，党的十三大又确定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中国政府根据党的基本路线，确立了经济建设、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等方面的基本原则和方针，确立了“三步走”的宏伟目标，即经过农村经济改革、城市与工业经济改革两个阶段后，开始全面结构性经济改革。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进入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

此时期，国际形势出现了许多新的变化。苏联由于国内工业发展停滞、农业歉收、外交孤立等众多原因，对外扩张受阻，逐步由原来咄咄逼人的攻势转为守势。而美国却由原来的收敛和退缩逐步转变为攻势。随着白宫易主，里根（Ronald Wilson Reagan）政府对外政策转为强调“恢复美国的战略威慑地位”，以抗击苏联扩张。同卡特（James Earl Carter）时期以“缓和”求和平不同，里根更强调“以实力求和平”。从国际宏观格局来看，美苏双方关系进

入一个僵持的阶段,呈现出一种互有攻守、各有得失的“势均力敌”战略态势。与此同时,西欧和日本等国及第三世界经济等各方面发展迅速,成为独立的力量,在国际舞台上发挥了越来越大的作用。全球政治格局逐渐从两极向多极变化。

根据变化了的国内外形势,中国外交战略进行了相应的战略调整。中国领导人基于对国际形势的宏观分析,认为世界和平是大有希望得到长期维护的。美苏争夺已经相对缓和,双方既争夺又对话。在这种情况下,继续奉行“一条线”的战略,已经不能适应发展了的国际格局。因为中国是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大国,块头大,分量重,已经成为独立于美苏以外的一支重要力量。中国如果同美苏任何一国结盟或建立战略关系,都势必影响世界战略平衡,不利于国际形势的稳定。

调整的的目的是使外交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服务。中国为确保国内建设的战略目标,需要扩大国际合作,需要一个尽可能长的和平与稳定的国际和周边环境。正如邓小平所强调的,“中国对外政策的目标是争取世界和平。在争取世界和平的前提下,一心一意搞现代化建设,发展自己的国家,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中国对外政策进行了此次重大的调整之后,所呈现的新特点是“独立自主”“真正的不结盟”。中国“不打美国牌,也不打苏联牌”,但“也不允许别人打中国牌”。中国对外政策,不再是“一条线”的联合,而是“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

应该指出的是,在促使中国外交政策转变的诸因素中,还包括美国对华交往中屡屡干涉中国内政给中国上的一课。这里最为突出的就是里根上台之后,改变了美国原先对中国战略地位的估计,主张强化与台湾的关系,并顽固坚持向台湾出售武器。中美双方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后,于1982年发表了《八一七公报》。美国政府在公报中承诺,美国“准备逐步减少它对台湾的武器出售,并经过一段时间导致最后的解决”。由于考虑到售台武器是历史悬而未决的问题,中国政府在维护原则的基础上体现了灵活性,没有坚持美国售台武器的停止期限。但中国方面明确无误地告知美国政府:台湾问题事关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美国不要以为“中国现在有求于美国”,就可以在台湾问题上为所欲为;即使“由于台湾问题迫使中美关系倒退的话”,中国也“不会吞下去”。



虽然中国总的外交政策进行了重大的调整，改变了“一条线”的政策，但中国的对美政策绝不是要与之“重新交恶”，恰恰相反，中国政府一直坚持谋求的是在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原则的基础上，使中美关系稳步发展。20世纪80年代，中美之间进行过多次高层互访。中国国家领导人在对美关系上均表达了希望双边关系平稳发展的愿望。例如：1984年里根总统访华，邓小平着重肯定了中美关系良好的发展历程和前景，同时又指出中美关系还存在台湾问题这一主要障碍。1989年布什总统访华期间，中方表示，中国政府历来重视中美关系，希望双方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原则指导下，增加相互了解和信任，扩大和深化各方面的合作。邓小平也表示要以“增进信任、减少麻烦”的精神进一步发展中美关系。

“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的发展。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际格局发生重大变化。东欧剧变、两德统一、华约失效、苏联解体的巨大变化，尤其是两极世界一极的崩溃所产生的冲击波，动摇了原有的国际关系的基础，使国际体系进入一个重新组合的时期。中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经受了国际格局骤变的考验。

在国际风云剧变的情况下，中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总原则没有改变，其变化主要体现在对美国的“对策”上。面对美国等西方国家对中国的施压和制裁，邓小平总揽全局，为中国外交提出了“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的战略方针，以后又陆续增加了“韬光养晦、善于守拙、决不当头、有所作为”，构成“28字方针”。中国“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从容发展同所有国家的友好关系”，坚持“韬光养晦，埋头苦干，不扛大旗不当头，过头的话不说，过头的事不做”，以超越意识形态、超脱的态度，经受住了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的冲击，以坚定的立场和灵活的策略，顶住了西方国家的压力和制裁，为中国的经济建设创造了有利的周边与国际环境。

五、中国特色大国外交

“先谋于局，后谋于略。”从纵向看，中国的改革开放，开辟了中国外交的新纪元。回顾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外交，其成功之处最根本的一点就是准确把握了国际形势发展和变化的大趋势，同时根据中国的实力、地位，实事

求是地确立外交的阶段性和路线方针。

新世纪开局十年之后，国际形势和中国自身发展将中国外交又一次推向新的历史起点，决定了中国外交必须与时俱进地做出新的战略调整。习近平同志审时度势，全面分析国际格局和国内形势的变化，高屋建瓴地提出“中国必须有自己特色的大国外交”。

中央外事工作会议确立了新形势下中国外交工作的战略目标、基本原则和主要任务：“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安全两件大事，牢牢把握坚持和平发展、促进民族复兴这条主线，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和平发展营造更加有利的国际环境，维护和延长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有力保障。”

（一）对外政治关系。在经济全球化和世界多极化的大背景下，我们应抓住时机，做好中外关系若干篇“大文章”。要敢于和善于作为，既开拓进取，又居安思危，维护既得利益，争取应有利益；同时又要长袖善舞，善于藏拙，潜心发展。中国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在四个方面谋篇布局：

一是大国关系。推进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建设方面取得积极进展，通过加强沟通、拓展合作、管控分歧，守住“不冲突、不对抗”底线，筑牢“相互尊重”基础，共同推进“合作共赢”目标；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基础得以夯实，互信与合作进一步增强，两国关系更趋成熟、稳定；中欧和平、增长、改革、文明四大伙伴关系进一步深化，利益交汇不断加深，战略合作水平持续提升；中国还积极发展与发展中大国及地区大国的友好合作关系。

二是周边关系。中国将继续把周边作为外交优先方向，与邻居们和睦相处、守望相助，共促和平稳定与发展繁荣，同周边国家关系总体上向更加积极的方向发展。

三是同发展中国家关系。中国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全面团结协作伙伴关系不断增强，在传承友谊、增进互信、推进合作、共谋发展等方面取得丰硕成果。

四是多边外交。中国深入参与和引导多边外交进程，与联合国和其他重要国际组织的关系取得新的发展。中国按照“志同道合是伙伴，求同存异也是伙伴”的新思路，秉持平等、包容和共赢的理念，力图走出一条“对话而



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的新路，迄今已同 80 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建立了各种伙伴关系，全球伙伴关系网络更加广泛，合作共赢道路越走越宽。

（二）对外经济关系。中国外交坚持为发展和改革开放服务的第一要务，紧紧围绕这个大局并为此营造更为稳定、更加友善的外部环境。在对外经济合作上，中国主张各国人民应该共享发展成果，每个国家在谋求自身发展的同时，都要积极促进其他各国共同发展。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的代表，中国在世界和区域的共同发展中理应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将继续给世界各国提供更多发展与合作机遇。未来五年，中国进口额将超过 10 万亿美元，对外投资将超过 5000 亿美元。中国认为，发展不平衡不仅是经济问题，更是世界和地区不稳定的根源之一。中国支持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和行将制定的 2015 年后发展议程，主张树立国际社会“利益共同体”意识，寻求各方利益的最大公约数，携手促进共同发展。

中国坚持奉行“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推动“一带一路”，从陆上和海上两个方向推进多条经济走廊的建设，达到缩小地区发展差距和推动区域一体化进程的目标。这既是对古代丝绸之路合作精神的传承发扬，又是契合时代精神、顺应各国加快发展的愿望且包容性巨大的共同发展平台，因而得到广泛积极响应。亚洲广大地区的基础设施急需升级改造，需要大量的建设融资，中国倡议成立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不仅深受亚洲发展中国家的欢迎，也得到越来越多发达国家的肯定。此外，丝路基金和互联互通伙伴对话会等机制也将发挥重要作用。中外经济包容合作、互利共赢，可谓“天时，地利，人和”。

（三）国际安全问题。中国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和平解决争端，反对动辄使用武力和以武力相威胁，主张摒弃冷战思维，各国共建、共享、共赢的安全之路，促进国际和区域的共同安全、合作安全、综合安全和可持续安全。

中国积极参与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行动，派多批次护航编队为国际船舶保驾护航。中国积极致力于维护地区稳定与安全，通过亚信峰会、上海合作组织和东亚合作框架等机制，促进防务安全交流合作。中国积极参与打击恐怖主义、维护网络安全、抗击传染疾病等国际合作，在国际安全事务中发挥着负责任大国的作用。中方积极参与热点问题的和平解决，倡导并践行“解